



東方哲學的智慧（五）

## 易學與世變

：以南北宋政局與明清鼎革為例

● 康雲山\*

### 一、前言

《周易》一書為群經之首，對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、倫理道德、文學藝術乃至自然科學等領域，具有深遠鉅大之影響，其作者與創作時代為《易》學史上爭論很久的公案，此處不擬考辨。然而，《周易》八卦之出現及六十四卦之創成，當在西周以前的遠古時代，殆無疑義。因此，《周易》流傳至今，應有四千年以上的歷史。而《周易》一書在漫長的千年歷史中，一直不斷的有人加以研究、注解、利用，相關著作多達數千種，形成複雜紛繁的《易》學流派，近人南懷瑾將之歸納為「兩派十宗」。所謂兩派，是指道家《易》學與儒家《易》學；十宗是指一占卜，二災祥，三讖緯，四老莊，五儒理，六史事，七醫藥，八丹道，九堪輿，十星相。事實上，隨著新的學術思想及自然科學的產生、發展，人們紛紛將之引入《易》學領域，舉凡數學、物理學、天文學、軍事學、預測學、管理學、教育學……等各種人文、社會、自然科學的學術，均與《周易》有所聯繫，使得《易》學愈來愈豐富複雜，其應用範圍也愈來愈廣，兩派

---

\* 康雲山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。

十宗實不足以概括《易》學的全貌<sup>1</sup>。本文將從歷史的重大事件，略述《易》學與世變之關係，以顯示《周易》在現實人生之應用。

## 二、宋代政情與易學

北宋之季，黨爭不休，盜賊蠡起，外患日熾，終於釀成靖康之禍，徽、欽二帝蒙塵。後來宋室南渡，高宗踐祚臨安，是為南宋時代。南宋初期，朝政頗有中興氣象，然而，隨著黃潛善猥持國柄，正言直諫的忠良之士相繼貶死；之後，「秦檜兩據為相，凡十九年，劫制君父，包藏禍心、倡和誤國、忘讎敦倫，一時忠臣良將，誅鋤略盡，其頑鈍無恥者，率為檜用，爭以誣陷善類為功<sup>2</sup>。」在此情勢刺激之下，史事派《易》學油然而興，史事派易學家感時撫世，於觀象玩辭之際，常常再三致意，以抒其用世之忱與感憤之情。李光、楊萬里可說是其中的典型與先驅人物。

李光於紹興 10 年（1140 年）論和議忤秦檜，被貶謫嶺南，自號讀易老人，著《讀易詳說》，其解〈比〉卦象傳：「地上有水，比，先王以建萬國、親諸侯。」云：

聖人觀此象，故建萬國、親諸侯，小大強弱，不相陵犯，或以德懷，或以力制，咸親比于我矣，自堯舜三代不敢廢也。至秦并吞諸侯，而郡縣之一夫叫號，天下響應，孰有親比于我者？王氏論本朝罷侯置守，則萬一有秦之變，豈可諱哉？靖康之禍，金人長驅如入無人之境，諸路守臣奔竄迎降之不暇，其間能仗節死難者，不過數人，何補于治亂哉？然則眾建諸侯，或大封同姓，以復唐虞三代之制，豈非今日之先務哉？（《讀易詳說》卷二）

又如解〈屯〉卦象傳：「宜建侯而不寧」，云：

自唐虞三代，莫不建侯樹屏，內以蕃王室，外以寧萬民，況屯難之世，干戈日尋，斯民離散泮渙，強弱相陵，眾寡相暴，非立主以定之，孰與保其生業哉？故利建侯也。（《讀易詳說》卷二）

觀此兩則解《易》文字，乃李光深感於靖康之禍，是因宋朝立國無大封同姓、眾建諸侯為屏藩，以致金人長驅，如入無人之境，故特揭櫫建侯樹屏，蕃王室，寧萬民

<sup>1</sup> 參郭建勳《新譯易經讀本》（台北：三民書局，民 85 年 1 月），頁 16~18。

<sup>2</sup> 參元·托托等撰《宋史》卷 473〈姦臣列傳〉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民 67 年 9 月）

之策。世變對於李光《易》學之影響於此可以覘之。

建侯樹屏之策以外，因權姦秦檜冒寵竊位，人小道長，君子道消，誠有識之士所深痛，李光於文字之中不免諷諭高宗，欲成中興之功，不可盡付秦檜，任用大臣亦不可過其分量，如〈蠱〉卦初六：「幹父之蠱，有子考无咎。」李光注云：

人君狃于宴安，湛于逸樂，天下蠱壞，非得善繼之子，曷足以振起之？宣王承厲王後，脩車馬，備器械，復會諸侯於東都，卒成中興之功，可謂有子矣，故考可以无咎，然則中興大業，難以盡付之大臣，〈蠱卦〉特稱父子者以此。（《讀易詳說》卷三）

又如〈大有〉九二象：「大車以載，積中不敗也。」李光注云：

象曰：大車以載，積中不敗也。物積于中而不敗，則其材可知矣！〈鼎〉之九四，至于折足、覆餗、其形渥、凶。言不勝其任也。孔子曰：德薄而位尊，知小而謀大，力小而任重，鮮不及矣！蓋非有剛健之材，處得其正，使當重任，未有不敗者。觀〈鼎〉象、〈大有〉二卦，聖人垂戒之意深矣！人主任用大臣，曷可過其分量乎！（《讀易詳說》卷三）

李光於〈蠱〉卦初六，列舉周宣王、唐肅宗中興之功，以釋「幹父之蠱，有子」之意，其餘文字與〈大有〉九二象之釋文，在在言及中興之業難盡付大臣，何況是德薄、知淺、力小之人，觀其文字，明眼人均可窺知，蓋針對秦檜之輩而發。《易》學家藉詮釋經文而寓託其政治見解，其用世之心昭然若揭。

### 三、明清之際的世變與易學

明清鼎革堪稱中國歷史的一大變局，由於《周易》重視隨「時」而行之義，因此，明清之際的《易》學，自然反映了世局的變化，如祀典台南大天后宮（原明朝寧靖王府邸）的建築及錢澄之、金士升、葉矯然三位易學家的《易》學著作可為其例。

祀典台南大天后宮（位於台南市永福路二段 227 巷 18 號）原為明朝寧靖王朱術桂之王府。朱術桂為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孫。明崇禎 16 年（1644 年）李自成攻陷北京，明思宗自縊而死，1645 年唐王朱聿鍵即帝位於福州，改元隆武，朱術桂奉表稱賀，被封

為寧靖王。永曆 18 年（1664 年）鄭經從金門迎寧靖王朱術桂，以監軍身分渡台，鄭經為示禮遇，於當年台江東岸邊高灘地興建王府供寧靖王居住，其正宅四殿即後來的祀典台南大天后宮。

寧靖王王府座向之分金軸線向西偏北 20.5 度，依伏羲先天八卦圖，乃介於兌、離兩卦，而指向坎、艮兩卦之中間。在方位上，兌卦在東南方，離卦在東方；坎卦在西方，艮卦在西北方。兌卦象徵澤，離卦象徵火，坎卦象徵水，艮卦象徵山。《周易·說卦傳》說：山澤通氣（山澤一高一低交流溝通氣息），水火不相謝（水火異性不相厭棄而資助）。所以，從伏羲先天八卦圖八卦的方位，王府佈局寓含東南之君遙望西北之民之意，也反映了當時的形勢。若依文王後天八卦圖，則介於震、巽兩卦之間，指向乾、兌兩卦之間。震卦在東方，巽卦在東南方，兌卦在西方，乾卦在西北方。王府座向寓含在東南復興，如日東升，萬眾一心，戰鬥於西北，驅滿復明大業終底於成之意<sup>3</sup>。

在明末清初山河變色之際，《易》學家錢澄之方 34 歲（1645 年），妻子方氏攜子投水赴義，長子灑祖走散，錢澄之則幸遇黃道周，為黃道周提攜入南明為官，惟南明政權一再更迭，永曆朝時，兩黨鬥爭不已，政局動盪不安，錢氏心灰意冷，之後，歸隱故里，潛心著作，致力《易》學研究，60 歲時完成《田間易學》一書。其書計引用 150 多條史事以釋《易》，觀其所引史事，無非賢明君王或忠臣義士之事跡，蓋有藉《易》學著作抒發政治理想或投射南明史事之意<sup>4</sup>。

明思宗死後，清兵入關，明朝宗室及遺臣輾轉南下，擁立福王（朱由崧）、唐王（朱聿鍵）、桂王（朱由榔），史稱「南明」，繼續抗清。南明享國 18 年（1644~1662AD），終因桂王被吳三桂害死於雲南府，明朝終告結束。明亡後，有一批儒者不事異朝，遯跡不仕，金士升、葉矯然即其中之二人。金士升生卒年不詳，為明末諸生，楊廷麟高第弟子，順治 3 年（1646 年）楊公殉節江西，門下士多從死者，士升在家未與，遂以道服隱於卜筮以終。窮十餘年之力，成《易內傳》、《易外傳》等書<sup>5</sup>。其書多引史事以論證《易》理並諷喻時事，如在〈頤〉、〈革〉、〈明夷〉等卦及〈繫辭〉，引述舜使契為司徒養民之心、禹稷救世之心、湯武安天下之心，其意乃以舜禹湯武能以救

<sup>3</sup> 以上參曾吉連《祀典台南大天后宮志》（台南：祀典台南大天后宮，民 90 年 12 月），頁 88~89。

<sup>4</sup> 參葉哲瑜《錢澄之田間易學研究》（高雄：高雄師大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民 100 年 6 月），頁 114。

<sup>5</sup> 以上參黃忠天〈世變與易學—清初史事易學述要〉，頁 11。（第二屆易詮釋中的儒道互動國際學術研討會，民 2008 年 12 月）

世之心治理天下而反諷明末朝政腐敗以致亡國改代<sup>6</sup>。又如於〈蠱卦·大象〉：「君子以振民育德」注云：「竊嘗謂風俗之壞，由君上亦由賢者。宋高宗忘讎偷安，壞隳綱常，使天下不知有君父，迄為元滅，此君上蠱壞世風之禍也。晉人放達成風，至於神州陸沉，江左不競，此賢者蠱壞世風之禍也。」其引史證《易》，亦藉古諷今之意，並抒發亡國之痛。

《易》為憂患之書，葉矯然值明清鼎革之際，其《易史參錄》亦往往藉史事寄寓個人之感懷，如〈大過·上六〉：「過涉滅頂凶，无咎」，葉氏注云：「愚謂：文履善、黃石齋，皆過涉滅頂者，殺身成仁，浩氣兩間，何咎之有？班掾論翟方進曰：王莽之時，蓋乘天威，雖有賁育，無益於敵，不量力，懷忠憤發，以殞其宗，悲夫！亦不可咎之意與！」文中以文天祥、黃道周二人，一不降元人，一不降清人，殉節成仁，雖死何咎？葉矯然於明亡後，曾應順治科舉，並中進士第，然授官不久，即掛冠而去，棲心墳典，著述以終，觀其注〈大過·上六〉字裏行間，似有寄寓孤忠之意。再如〈蠱卦·彖傳〉：「剛上而柔下，巽而止蠱」，葉氏注云「明之將亡也，當神宗末造，深居高拱，百事叢脞，沿於光堯，蠱壞已極矣！思宗繼統，初除閹璫，有似艮剛，然卒非大有為之資，苟止而已。而內外臣工，媮安習久，聚斂黷貨，惟日不足，全不知振民育德為何事，災害並至，賊民興，喪無矣！雖曰天運，豈非人事哉！讀蠱之剛上柔下，不勝太息！」葉氏注文論述光宗、熹宗以至思宗，朝政蠱壞，導致明祚滅亡之原委，不禁感傷太息<sup>7</sup>，其《易》學著作反映世變，於此可見一斑。

#### 四、結語

《周易》之創作，原本就具有實用性，以史證《易》，可說是實用性的表現。又《周易》一書亦具有相當的哲理性、文學性與藝術性成分，故《易》學家面對世變之際，藉著注釋《周易》時，抒發其政治思想、歷史觀念與身世感懷，亦契合《周易》一書的性質。南、北宋國勢、政情之變化紛擾，以及明、清之朝代交替，乃中國歷史之兩大變局，對於《易》學家心靈之衝擊可想而知；尤其是對於明朝宗室寧靖王朱術桂

<sup>6</sup> 參蔡鴻江〈金士升易內傳援述先秦史事析論〉，頁16。（同上研討會）

<sup>7</sup> 同注5，頁7-8。



而言，宗廟家國隳壞淪亡之傷痛，更甚於他人。故或引史證《易》以評論世變，抒其感懷，或藉王府建築寓託驅滿後明之志與思念故國子民之情。總之，《易》學特重「時」義，南北宋國勢變化與明清鼎革之世變，對於其時《易》學之發展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。

